

绪 论

20 世纪已接近尾声。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既有狂飙突进、捷报频传的喜人成就，也有失误再三、江山易帜的惨痛教训。在世纪之末，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深入思考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无疑，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又是极为艰巨的工作，它要解决的，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既是重大的学术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地开展这一工作。

本书试图通过构建一门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支学科——社会主义价值学，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在这篇绪论中，我们将着重探讨建立社会主义价值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

一、社会主义研究的价值学视角

提出从价值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些重要的因素：

（一）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

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已有几百年历史。从起源上看，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开启近代社会主义运动

先声的托马斯·莫尔,在 1516 年发表的代表作《乌托邦》中曾指出了“乌托邦”一词的两种不同的希腊语来源: Eutopia 的意思是“美好的地方”而 Outopia 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可见,乌托邦之作为社会制度设计,实际上只是一种超历史的道德价值理想,只体现着价值合理性,而在历史上则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全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基本上都终结在仅就价值合理性立论的乌托邦传统之中。稍晚于莫尔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写作的《太阳城》是如此。18 世纪的法国人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如此。直至 19 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提出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以理性论为基础的。②在他们看来,和封建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个违背理性、正义原则的社会,未来社会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了永恒理性的社会。他们把社会主义原则设定为:人的个性全面发展 消灭城乡对立 消灭私有制 消灭雇佣劳动 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消灭阶级对立。

毋庸置疑 空想社会主义之“空想性”从思想基础看 在于

莫尔自己表示,乌托邦制度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他说:“虽然我希望看到乌托邦中的许多东西能在我们城市中得到实现,但是,对此,我更多的是寄托以希望 而没有过多的奢望。”

我们从 19 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对《乌托邦》一书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乌托邦传统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延续。卡贝说:《乌托邦》“是人类第一部描述共产制度如何运用于一整个国家 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的著述,它依靠独立的理性思考,对伦理学、哲学和政治学作了重大的发展。在我看来,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 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也是最伟大的贡献。”(《伊加利亚旅行记》第 2、3 卷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第 253 页)。

它仅从价值理性立论提出社会主义学说。这里的价值理性指的是以某种超验的生活目标作为特定的价值存在，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和认识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在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中寻找真理的道路开辟出来以后，空想社会主义遭到批判、拒斥乃至讨伐，便是极其自然的事。

但是，仅就价值理性立论的社会主义学说被否定，并不意味着价值理想本身的意义被取消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连续性，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人文价值理想。价值理想——世界应该如何的概念的意义，已为多位学者所揭示。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指出“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张力，为人类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的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卡尔·曼海姆则认为：“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①我国学者刘述先先生在《文化哲学》中也指出：“现实的不合乎理想并不能够否定高远理想的真实性”“如果没有健全的哲学文化理想为主导，不只国内外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纷乱如麻无法解决，即使是个人也将被挤压在现实的夹缝之中而不免于疏离，丧失自己清明反省的心灵与创造建设的能力。”^②

简单说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文价值理想，其特殊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社会主义者超越资本主义现存秩序、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努力。它表明，人类在发现自己所创造出的一种文明的局限后，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理想的社会。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研究中，人文价值理想这一维度是无论如何不能缺失的。缺此，则无以名、也无以成社会

卡 尔 ·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52 年英文版 第 236 页。
刘述先：《文化哲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5 页。

主义研究。

（二）价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坚决拒斥空想主义。他们曾因“社会主义”一词为厚重的空想色彩笼罩而拒绝使用它。恩格斯在 1890 年给《共产党宣言》的德文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谈到了这一宣言为什么不叫做《社会主义宣言》。他说：“在 1847 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①无疑，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同当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区别开来，正是为了拒斥空想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与他们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变革社会的根本动力和具体途径紧密相关的。在他们看来，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并不在于详细地描述和构思未来社会的方案，和对资本主义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而在于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并从中提出无产阶级的实践任务。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也就不再是理论家在书斋中的虚构，不再是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4 页。

历史的道德预设，而是从资本主义全部物质条件的总和中所必然揭示出来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合规律性的角度展开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并没有舍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他们把这一价值理想设定为体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性原则，这是一个使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实现自身解放的原则。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他预言，未来社会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恩格斯也同样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实现了人类不仅在物种关系方面而且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提升，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获得了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贯注了价值理性精神的，价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并不表现为否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而是表现在，它从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中提出价值理想，并且科学地论证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手段、主体力量等等。

（三）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解释范式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主义价值实现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基础

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曾经预测在西方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生活终究会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就成了我们总结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解释范式。

统观十月革命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史，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就成功经验而言，列宁、毛泽东等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正视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同其目的之间的历史性课题，进行了一系列极富创意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列宁是辩证法大师，他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列宁在这里首先承认社会主义是要有物质前提的，但他认为这种前提也可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再逐步取得。毛泽东则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可能由工业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来取得。“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②这不仅是一种可能性（列宁）而同时也是一种必要性。这样，在马恩那里的社会主义价值实现与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历时态问题，被共时态化了。无论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晚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第6页。

年构想 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工业化道路”等思想，都表明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其实现基础关系问题的自觉 表现了他们对“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把握。

同时 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处理上述“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时 也曾有过种种偏失。一种倾向是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求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当下实现。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与列宁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有关。列宁当时的基本设想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 按劳分配，严格的计划经济，无商品货币的产品交换，半军事的劳动纪律，等等。这大体上照搬了马恩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设定。而在 20 年代后期斯大林宣布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从价值观角度看，正是他从所有制、阶级结构等方面强化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结果。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与片面张扬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有关。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被淡化甚至忽却，社会主义价值有时被极端化为一个抽象原则。

作为对上述倾向的纠偏，另一种极端的认识就是，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把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在这种倾向看来 拒斥空想主义 必然要“仿效资本主义前辈”“积累技术手段 甚至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已经清楚 正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失却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路线、方针、政策 引发了 20 世纪后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折射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也就理应成为我们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提出从价值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党的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无疑是多方面的，从思想史角度而言，这一理论是结合社会主义的现实演进，就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交出的一份漂亮答卷。

首先，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定的社会主义价值是充分认同的。他反复强调：“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①“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②同时，鉴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未完结的开放系统，也鉴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背景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的理想目标追求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从现实历史条件而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目的，提出对现实的超越使命，即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时又十分注重社会主义价值实现基础的建设、实现手段的选择，因而在他的理论中体现的是与内在性相统一的超越性，是即内在即超越。他对手段、方法的重视是贯注了价值理性、目的精神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作为他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正是这一辩证性质的集中体现。

如此而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他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这九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既回答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形态问题，又回答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原则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价值在马恩那里主要还处在理论必然的预设，那么邓小平同志则揭示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实现这些价值原则的现实途径和方法，从而真正使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从理想走向现实。可见，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研究、掌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我们今天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规范、指导意义。通过分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意蕴，我们看到，这一理论是一个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由此，任何主观主义、片面性、绝对性的认识和做法，任何否定改革开放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左”的或右的倾向，都是与这一全面纲领格格不入的，是我们要加以反对的。

（五）提出从价值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还来自于回应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价值热”的需要

当代世界出现的“价值热”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现象。就社会主义运动领域而言，这一“价值热”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重要事实。

从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社会制度提出

的挑战渐趋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是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美国政府智囊兰德公司顾问的日裔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他于 1989 年以“历史的终结”为主题作了一系列讲演, 发表了一篇文章, 后来又于 1992 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了专著。福山在书中从思想史的立场讨论了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意义。他认为, 到目前为止, 历史上反民主、反自由思想的封建制度、法西斯主义、世袭王朝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都垮了, 只有“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还留了下来, 今后必然不再会有任何思想体系可以向民主思想挑战了。“自由民主制的理想已经不能再作完善了。”^① 人类探索真理的历程在 20 世纪末期已经达到了终点。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1992 年此书以 14 种语言同时推出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有人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宣言书, 正是鉴于它表达了西方人的一种乐观情绪。当然, 对此书的反响也包含了一些批评性反应在内。右翼的批评认为, 福山兴高采烈地宣布的, 不过是“自由主义的终结”。中派的批评认为, 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意义不在于一种特定制度战胜另一种特定制度, 而在于“开放社会”战胜了“乌托邦”, 是“乌托邦的终结”。左翼批评则认为, “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 乌托邦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纲领, 它是想象能力的政治表现。当前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对于上述种种说法, 我们如果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及其在现时代的意义, 就不能作出积极的回应。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 当代世界上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 多以追求人道主义价值自许。比如具有广泛影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

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1992 年英文版 第 11 页。

思潮就以道义立论，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是人类的道德感，社会主义就是“自由、公正、互助”等价值原则和道德目标的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样致力于张扬价值理性、价值维度，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称为反科学的浪漫主义传统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入。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诸作家们，或通过深广厚实的历史研究，或通过精微细致的逻辑分析，指出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价值理性的退场、丧失、耗尽。批判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马克思学”的创始人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乌托邦主义，它原则上是基于伦理的必要性，而不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①。这些流派、思潮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关注，是否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的真正承继和在现时代的发挥？它们为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怎样的经验教训？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亟待我们作出内在的评析，而不是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据此我们提出建立一门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支学科——社会主义价值学，来全面、系统地研究、探讨上面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社会主义价值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在讨论了建立社会主义价值学的必要性之后，我们接着来

^① 吕贝尔：《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1981年英文版，第26页。

讨论一下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等问题。

（一）社会主义价值学的主要问题

“价值学”(Axiology)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 P. 拉比于 1902 年和德国哲学家 E. 哈特曼于 1908 年提出的。一般而言，价值学即是一种关于价值的学说，一种对价值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说。这些价值问题包括了价值的本质、价值的作用、价值的认识、价值的实现和创造等。

社会主义价值学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与价值学的交叉学科，它是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的学说，是对社会主义价值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说。相应地，社会主义价值学把社会主义价值的本质、认识、实现和创造、作用等问题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理论方位来看，社会主义价值学虽是一门交叉学科，但总体上属于社会主义理论范畴。这是因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价值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价值学问题^①为范式，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相统一地全面发展。当然，哲学价值学是社会主义价值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学科，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也反过来为哲学价值学增添新的内容。

把社会主义价值学当作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支学科，我们就可以结合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规划一下社会主义价值学的研究任务。这一任务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开拓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停留在“空想一科

本书中价值学与价值观是在互换意义上使用的。价值观作为对价值的根本看法，与“价值观念”概念是有所区别的，价值观念是关于某类事物的意义或价值状况的看法。

学”二分的思维模式上，价值理性、价值原则不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回避，就是被当作空想的同义词加以拒斥。这种在价值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掩蔽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主义价值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扩展研究视野，从价值观角度梳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揭示出对社会主义与价值合理性关系问题的历史回答，为我们今天求解这一重大问题提供借鉴。

2. 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未能摆脱“空想—科学”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模式，与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片面把握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科学社会主义”行名，其科学性无疑应得到强调，但由此对其价值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则同样掩蔽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社会主义价值学就要揭示出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价值理性，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角度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 回应当代世界出现的“价值热”的挑战。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挑战，林林总总，很多涉及价值观问题。社会主义价值学应当积极回应这些挑战，无论是要求社会主义“从科学回到乌托邦”，张扬价值理性、价值维度的思潮、流派，还是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乌托邦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的思潮、流派，我们都要能够与之或对话、或批评、或交融，以建构起富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4. 总结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

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成功或挫折，都有许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社会主义价值学应为这一工作提供重要的视角、维度，也就是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其实

现基础、手段、途径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处理中 透视一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现象、模式等等 从中揭示出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5. 规范、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考察，社会主义价值学还应从中探寻出社会主义价值合理性与其实现手段之间的合理关系 探寻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 规范、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换言之，我们从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有过什么”的研究中 还应得出“应该怎样”的规范性结论。当然 这一“应然”是从“已然”中得出的 因而随着历史发展 它也“应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以上诸项，是我们对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领域的初步规划，这一工作的进行、完成，也即意味着社会主义价值学积极意义的取得。

（二）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

如何开展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清理地基”，从评析研究社会主义价值问题的已有思路入手。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研究，已形成了两个相距甚远的传统：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两种解释、研究传统的分立，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倾向的反映。其中科学主义传统把科学社会主义解释成一门与价值理想无关的客观科学，在这种解释传统看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之所以是必然的、决定的、

“人本主义”与本书后面频繁使用的“人道主义”一词有着细微的差别，本书则将两者作为同义词使用。

不可避免的，在于作为社会主义解放根源的工业生产力的必然增长。人本主义传统则把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划归西方人道主义阵营，认为马克思留给人类的遗产主要是一个响亮的道德呼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抗议，是一切过去最伟大的人本主义思想所共有的乌托邦。

从纯粹历史的角度看，把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科学化、实证化的倾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就有人这样做了。为此，马克思强调不要把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恩格斯写了不少文章、书信，坚决反对对历史唯物论作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解。第二国际时期则开始了这两种解释传统的形成，考茨基与伯恩斯坦都是从科学与伦理或价值分立的角度来强调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一面，考茨基认为“科学高于伦理学”，而伯恩斯坦则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未曾包括伦理要求、价值理想，提出需要有一门伦理学来补充，“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从而开了从伦理必要性来解释马克思学说之端绪。第二国际以后这两种解释传统得到了延续。直至今日，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仍是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这里我们不拟全面评析这两种解释传统的源流影响、得失成败。纯就理论研究角度而言，虽然这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特点，但把科学性与伦理性割裂开来的做法，无疑遮蔽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质。即使如伯恩斯坦那样，提出以伦理学、价值学来补充科学，其“科学”与“伦理”、“价值”仍是不相关联的。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就提不出结合人类历史实践实际发展的价值理想，或者内蕴了价值理想的科学学说。无疑，这是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的目的、任务相违背的，也因此，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两极对立，

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社会主义价值学的方法论

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何以可能？落实于社会主义价值学的方法论上，就是一个如何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原则的问题。

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是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相表里的。马克思从历史实践的观点揭示出社会主义价值的生成及其本质，提出合乎历史必然性的价值理想，并论证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力量、手段、方式、途径等等都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都终结在仅就价值合理性立论提出“世界应该如何”问题的乌托邦传统之中，那么马克思超出乌托邦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他从历史必然性立论展开世界的“应然”何以可能的问题。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是历史观革命带来了价值观革命。对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问题作人本主义、乌托邦主义的理解，无疑是看不到马克思价值观的历史观基础所致。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历史观革命同样看成是一场价值观革命，即考察马克思历史观的价值观意义。马克思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为了寻找外在于人的价值活动的历史因素或者发现外在于人的价值活动的历史规律。否则，他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工作根本没有必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他的工作，就在于通过对人的活动历史的研究，发现已有的人的活动方式、生存方式的局限性从而为人类寻找出路。具体地说，马克思历史观证明，资本主义远非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还要发展到

更高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①在这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超越，即是对停留于现存事物框架、结构之内的实证主义立场的超越。

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历史观和价值观是相统一的。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问题，必须把坚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当作首要的、基本的方法论。

三、社会主义价值学的基本构想

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工作。本书并不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价值学体系为追求目标。构建完整体系的工作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无法完成的，这既是研究者学识水平所限，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价值关系正处在较大的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在我们这本书里，试图做的只是一些准备工作，为完成前述的研究任务清理一下“地基”。本书的全部文字都是带有“导论”、“引论”性质的。如果我们提出的研究范式为今后的社会主义价值学研究起了一些基础性作用，那我们就十分高兴了。

有鉴于此，本书在构想上比较注意突出这样一些方面：

（一）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过程为全书主线。既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形态上对两者统一的实现过程，以及他们所奠定的两者统一的广泛基础，又考察这两者统一在现实实践状态中的实现过程，揭示出这一问题在国

联系到近年来在西方流行的“历史终结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之价值观意义更加显著。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历史的“至善”，马克思则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视为人自身历史的真正开始。